

蔣經國論

曹聚仁

111
023
512

# 蔣經國論

曹聚仁著

1978年5月26日

HS

# 蔣經國論

## 目次

前記	三
新政漫談	八
a. 幾件史實及論釋	八
b. 論所操之術多異	一一
c. 論人言不足卹	一三
d. 論用人及爲政	一五
如是我聞	二〇
a. 歸來	二〇
b. 熊式輝伸出手來了	二三
c. 頂石曰做戲	二七
d. 泰和的看法	三〇
e. 父子之間	三四

x.	w.	v.	u.	t.	s.	r.	q.	p.	o.	n.	m.	l.	k.	j.	i.	h.	g.	f.
餘話	再添上一筆吧	一夕話	從烏江到垓下	杭州會議	溪口的春天	杜那克傻子及魔鬼	武松碰上了西門慶	一本難支大廈	副總統之爭	一個熱鬧的夏天	在那黯淡的日子裡	勝利之夢	蔣氏父子與史太林	重慶向他在招手	哈姆萊脫在中國	第一個三年計劃	從舊贛南到新贛南	阿契理司的脚跟
.....	.....	.....	.....	.....	.....	.....	.....	.....	.....	.....	.....	.....	.....	.....	.....	.....	.....	.....
一〇八	一〇四	一〇一	九五	九二	八七	八二	七八	七二	七〇	六七	六四	五九	五五	五二	四九	四五	四二	三八

## 前記

### 一

一九三九年冬天，我們溯贛江而上，到了贛州。那時，蔣經國先生初任贛南行政專員，推行新政；秦和人士，（秦和江西戰時政府所在）以疑慮眼光在注視他的施為，給他帶上紅帽子。當時，我寫了一篇「一個政治新人——蔣經國」分刊金華東南日報和香港星島日報。這篇通訊，先後有英法俄譯文，影響頗大。接着寫了「蔣經國傳奇」「瑞金心影錄」那幾篇通訊，都是替他的新政作解釋的。我另外寫了一篇「新政漫談」，這才說了我的政治觀點，我以為蔣經國雖是標榜王陽明，他的新政，乃是屬於王安石那一型的。後來，我在贛州，替他辦正氣日報，我就很少寫有關他的新政的通訊了。寫新贛南新政的朋友，如大公報的徐鑄成、楊剛，國際新聞社的孟秋江，看法也和我差不甚遠。只有劉思慕，（衡陽力報總編輯）到過贛州，並沒寫什麼。一九四四年，周維新寫了一篇評新贛南政治，刊在南平東南日報，褒貶互見，許多話刺痛了蔣氏的心。

勝利之後，我從江西到了上海，朋友們殷殷以贛南新政為問；我就寫了一篇「蔣經國在贛南」，刊在上海的週報，要算第二次的報導了。後來，蔣氏奉命在上海督導金元券的發行，他又

成爲海內外注意的新聞人物，若干荒唐的傳說又浮了起來。我才開始在上海前綫日報寫「蔣經國論」，連載二十多天；後來，就把新政漫談當作引子，彙刊了一本小冊子，題名「蔣經國論」，附上了周維新的評新贛南政治和蔣氏的「夜宿虎崗有感」，還有幾篇蔣氏的演講詞，那是第三次的報導。這一本「蔣經國論」，仍以「新政漫談」作引子，至於報導蔣氏的言行，比較廣泛而客觀。不過我的觀點，一直沒改變過。我寫這一類報導文字，總把自己當作百年後的史家來着筆，力求撇除政治的成見，知人論世，放在時代環境中去理解他的。有人設想我的報導，一定劇奏美新，那就想錯了。

蔣氏之爲人，是給中國這個官僚主義的政治社會拖壞了的；他雖是在蘇俄大革命時期受長期的社會教育，可是，一回到了中國，就變成中國型的官僚。生活方式，也不免淪於腐化，以至於他的朋友，慢慢離開了他；因此，我寫到了「阿契理司的脚跟」那一節，不禁投筆三嘆。克林威爾說：「甞我須似我！」我又怎能不寫下去呢！我所寫的，力求其正確，真實，蔣氏的政治前途，正在開展，我希望他從沉淪中浮起來將來，不要再寫這一類使人短氣的文字才好。

## 二

中國這個社會，歷史的負累太重，很快就把每一代的青年都拖了下來，不獨蔣經國一人的命運如此。我初有知識時，就聽到了袁克定的故事；那位公子，急於要做皇太子，甚於曹子桓，而

學識文藝，却又差得很遠。晝家另外一個有名的公子袁寒雲，我認識他時，不過四十來歲，在上海做做詩，寫寫字，玩玩女人，抽抽鴉片，自比曹子建，小有才名而已；老式的大少爺派頭，不足道也。後來，我們所知道的四公子：盧筱嘉，就像戲台上的花花公子；段宏業，只會下圍棋，都是要不得的。比較好一點的，要算張孝若，但在發展實業上，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成就。張學良一生，既荒唐，又胡鬧，後半截落得這場莫名其妙的結局，也可說是自作自受。蔣百里先生有一回談到張學良的故事，他形容這位公子的神經過敏，喪魂失魄的樣兒，不禁爲之失笑。孫哲生這一位公子，要算懂得一點事，讀得一點書，有點政治家的風度，然而，也逃不了公子的性格。莎士比亞的名劇中，有哈姆萊脫王子其人的，也許公子階層的人，逃不了這麼一種閃電型的性格吧！

要把第二代的公子教育起來，原是儒家政治理想之一。教育「太子」使之成材，於是爲之相而行其道，這就不以致太平。不過，諸葛亮畢竟扶不起劉阿斗，「此間樂不思蜀」，這樣的第二代，正是政治上的悲劇！近百年中國政治史上，真正把第二代人教育起來的，也只有曾國藩一人而已。（曾國荃那一家就不行了。左宗棠和李鴻章，也不會把下一代教育起來。）曾國藩可說是有氣度的人，他把曾紀澤教育得比自己還胸襟開朗些，最不可及。我們只要接近曾家的四圍人物，都還有點曾氏的氣度與學識，（如吳興的俞家江家，上海的穆家），該是最了不得的成就。

我們讀了蔣氏的傳記，他們那一羣人，似乎也在以曾國藩自期；以蔣氏的地位、聲望和時

機，自可以和會氏爭歷史上的地位；然而，他之爲人，既無以繼孫中山的大業，連做一黨的領袖，都不十分成器的。這位在莫斯科吃黑麵包成長的公子，照理應該比吃白麵包的曾紀澤高明一點。（一開頭頗有那麼一點氣概，連毛澤東聽了都嚇了一跳。）誰知越變越不成，越變越成爲他父親的兒子呢！

### 三

語云：「君子愛人以德！」我自己確對於政治鬥爭毫無興趣，我更無意於做陳布雷；陳布雷的結局，更不足爲訓。可是，爲了國家民族，對於這個和國運相聯繫的公子，却寄以深切的期待。過去多少錯誤，已經無從挽救，來日方長，在大時代的轉角上，總該好自爲之的！我還記得在南京鼓樓外的一角上，徐季元、楊明、黃中美諸兄都在一起，還有一位和我自幼同學的黃兄，大家感慨了一番。徐兄對我說：「我們跟他（經國）在一起的，說得太多了，他也聽厭了！還是你們外來的，多說幾句吧！」他的意思要我多說一點。第二天，經國先生到前綫日報南京分社來看我，我就率直地說：「國民黨的王朝，就看這六個月了！這六個月沒有辦法的話，你們的天下是真的要完了！」不幸而言中，蔣家天下，果然在那年十一月開始崩潰了。我是和桃花扇中的柳敬亭一般，（柳敬亭本姓曹）將五十年興亡看飽，一肚子感慨的！這一小冊子，也就是孔雲亭寫桃花扇的一樣心懷，「剩魄殘魂無伴影，時人指笑何須躲」呢！



大陸解放以後，我在上海還看見了一些當年在贛州替經國做事的朋友。這些朋友的離開對於經國，該是最大的教訓；他們若不是覺得經國這一邊的天下真的絕望了，是不會走開的。G兄北行的前幾天，和我還談了好幾回。G兄年輕時期，也是社會革命的激進派，後來成爲CC系的中堅幹部，最爲陳果夫所契重；新贛南建設時期，他是一心一意替經國打天下的；後來也到關外去做過民政工作。他和我一般，看着一個政治新人的腐化與衰老的。一個四十多歲的人，乃竟如入暮境，想到當年「青年的天是不夜」的吼聲，恍然是一場舊夢呢！我們的心頭，响着的，還是桃花扇中幾句下場詩：

「當年真是戲，

今日戲如真；

兩度旁觀者，

天留冷眼人！」

## 一、新政漫談

『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但看利害分數如何。』

——朱熹：論治法

昨日，高理文先生語我：「建設贛南，新猷初展，緬想前賢，遺規可尋：我們在搜求王陽明當年治贛的方略。」我以為國人談政，喜「因」而不喜「革」；王陽明的治贛，還是偏於「因舊」的，不足為法，要談政治改革，當從王安石的新法中去借鏡；因尚論古人，漫談新政。

### a. 幾件史實及論辯

宋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朝傷國用不足，詔學士議……王安石曰：「……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司馬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

熙寧三年二月，新法既行，物議沸騰；司馬光投書王安石，極言新法之害，原書甚長，（凡三千餘字）其要曰：「……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適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圍視，銜蹶爭進，各鬥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貨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僱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以上論養民不當講求貨利。）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今介甫爲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斲斲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

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子之志乎？（以上論爲政不當多所變更。）」當時，王安石答書道：「……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生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謗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洵洵然？」

元豐三年三月，上諭王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爲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卹，祖宗之法不足守。一昨舉士院進試館職策，專指三事，此是何理？』」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每事惟恐傷民，此亦是懼天變。陛下順納人言，無小大惟言之從，此豈是不卹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卹者，苟當於禮義，則人言何足卹？故傳稱禮義不愆，何卹於人言。鄭莊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敵大讎，乃詩人所刺，則以人言不足卹，未過也。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是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祖宗何爲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爲祖宗之法皆

可守，如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彼議論必更紛紛矣。」

平船山宋論論神宗變法，（卷六）「神宗有不能暢言之隱，當國大臣，無能達其意而善謀之者，於是王安石乘之以進。帝初蒞政，謂文彥博曰：「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此非安石導之也，其志定久矣……夫神宗之誤，在急以貧爲慮，而不知患不在貧，故以召安石聚斂之謀而敵天下。然而無容怪也，凡流俗之說，言強國者皆不出於聚財之計……」

b. 論所操之術多異

（客）——王安石對司馬光說：「我和你所操之術多異，所以論議政事，彼此不能相合」。司馬光是儒家，王安石也是儒家，他們所操之術，何以多異呢？

（主）——據我看來，司馬光是儒家，王安石却不是儒家；說得正確一點，王安石蓋是名法家。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家，不獨管仲、子產、李斯是法家，諸葛亮、王猛、張居正也都是法家，連會國藩也近於名法家。漢武帝尊信儒術，但他所信用的並非是申公、董仲舒、趙綰、公孫弘那些儒士，而是桑弘羊、張湯、孔僅那些刑名之士。漢宣宗二年，皇太子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

足委任？」這段對話，可以看出兩家所操之術，原本是不同的。

（客）——請問其不同之點何在？

（主）——名法家治天下，着重理財，苛刑罰，儒家則主張輕刑罰，薄稅斂，所以李斯，桑弘羊都主張政府統制經濟，被儒家譏為聚斂之臣；司馬光就說古聖賢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譏王安石「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儒家的國家經濟觀，本於孔子「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一句話，正和法家相反，要藏富於民的。王船山在這一點，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宋神宗的心意，在養兵備邊，求府庫之豐裕；王安石所以得君，也在於理財的主張，王安石理直氣壯地答復司馬光道：「我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這是兩家出發點的大不同處。

（客）——你看，從社會國家的立場看，究竟誰是誰非？

（主）——我們承認王安石變法是一片愛國家的熱忱，而司馬光的反對新政，也是一片愛國的熱忱；他們兩人都不自私，更不自利。但從社會國家的立場看，儒家談政，多不懂時宜，實際是行不通的，我們不能不說王安石「是」而司馬光「非」。

（客）——何以見得儒家的主張，多不達時宜，行不通的呢？

（主）——儒家談政治，不主張理財，還便是行不通的；一則「藏富於民」，就會害民。因爲讓人民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就會造成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畸形經濟，弄得政府沒有錢。一般

老百姓也沒有錢，錢都流到少數人的囊中去。二則政治一切施設，一切建設事業，都非錢不行；不善理財，則任何政治理想都不能實行。用現代政治眼光來看，政治愈進步，則賦稅愈重；薄稅斂的話，除非迎合一時社會心理，發不負責任的空論，否則他就會自己打自己的嘴吧！

(客)——王安石說：「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這如何能做得到？

(主)——照王安石的計劃實行起來，那是可以做到的；因為他除了整理兵制，整理財政以外，還有把許多重要企業由國家經營之意，(青苗法即係其計劃之一。)做得澈底一點，便是實行國家社會主義，由政府統制一切經濟機構，自然對一般民衆不必加賦而國用可以常足了。此外，唐代還有一位劉晏，也是善於理財的，他「因平準法，斡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用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這都是迂拘的儒家所不能做的。

### c. 論人言不足卹

(客)——反對王安石的，如司馬光、程頤、韓琦、富弼……都是行篤敬，言忠信的君子，而其所進的言，又都是不自利的輔世養民之言，彼此的政見或不同，但這一類的人言，豈能說是不足卹嗎？而且當時的士大夫，何以百口交謫，都反對王氏的新政呢？

(主)——歷史上，儒家常是在野的，自命清議，歡喜作不負責任的批評，無怪王安石說是

人言不足卹的。若是王安石做一個因襲舊制的太平宰相，過了三五年，還是一無成就，弄得物議沸騰，那就非理會那些人言不可。現在王安石所做的，是一場大規模的改革，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不得變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那就在實行之初，無論天下怎樣洶洶，羣言怎樣囂囂，只能認爲不足卹，依着原定計劃做去，且做個三五年再說。蚩蚩者氓，總是難與謀始，可與觀成的，子產初相鄭國，國人欲得子產而殺之，過了三年，國人又只怕子產身後沒人繼承他的相業了。北宋那些士君子，批評王安石的新政，既嫌過早；後來又意氣用事，一筆抹煞新政的好處，自然更不成話了！

（客）——假如我們推行新政，對於社會上的「人言」「物議」，該取怎樣態度呢？王安石和司馬光那一羣之間，難道沒有一條通力合作的大路嗎？

（主）——我說過了，「因」與「革」不同，要談改革，那就管不得一時的人言物議了。何呢？一場改革，就要改變千千萬萬人的生活，這就要引起千千萬萬的反對辯議；如清末廢八股一事，我們看來，真是再好再切要也沒有了；可是康有爲變法廢八股，就有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反對他，自然人言囂囂物議紛紛了，難道說有了這些反議論就不必談廢八股了嗎？現在談土地改革，地主一定反對，談統制經濟，商人及資本家一定反對，談民權，紳士一定反對，沒有不卹人言的決心，什麼改革都行不通了。至於王安石和司馬光之間通力合作



的大路，我以為當由司馬光這一方面來打開的。程明道晚年曾說，新政所以害民，半由於士君子這邊不能幫着做的原故。朱熹說得好：「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但看利害分數如何。」王安石行新政，當無不能「無全利而無害底」。士君子這一邊，不要鬧意氣，大家幫着做，就是害多的，也能做成利多的了！司馬光他們怪王安石「於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懷讐圖視，術鬻爭進，各鬥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其實士君子們故意拆台，袖手觀成敗，又叫他如何能不另找新進之士呢？我有一們偏見，凡是有利於社會國家的改革，社會人士都該幫着去做；即自己所反對的，也應該幫着去做；「舊的」必須讓路給「新的」，而且必須替「新的」去開路！

d. 論用人及爲政

（客）——無論怎樣說，王安石的新政，總是行得不十分好；推行新法，「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轍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謗議沸騰，怨嗟盈路。」司馬光所說的也是確實的。語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用人却是要緊的。

（主）——前人所謂「用人」（任賢使能）問題，便是現在所謂「訓練幹部」問題。王安石